

第一章 绪论

一、引言：关于中国现代化^①问题的思考

我们所说的现代价值观念，它与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世纪价值观念不同。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看，现代价值观念体系是以工商业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为基础，尔后在大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成熟的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念体系。一开始，它主要是反对烂熟了的农业文明的价值观念体系。在西方，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反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价值观念体系而开始了西方的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运动；在中国，则由理学内部分化出的心学——阳明学的发展而导致“王学左派”——泰州学派的产生，以反对程朱理学的理论形式开启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运动。由于中华民族在近现代中所遭受的不幸，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把“天朝大国”打落成血泪斑斑的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转入了苦难、曲折的历程。复杂的历史现象模糊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因而在现代文化的论争中，出现了“中国哲学文化^②有没有自己的

本书将近代化与现代化合为一个英文词 *Modernization*（现代化），与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结合起来，从而在概念上达到统一。

哲学文化：此为本人在该专题下特别构造的一个重要概念，其要义是以哲学为核心，论述文化思潮。

近代化”的疑问。由于受“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的影响，许多现代化论者在理论上都认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①的观点，从而在“文明化”的表面合理性支持下掩盖西方各国对中华民族及其他后发展民族实行经济侵略的性质。而中国的一些学者，则有感于现代中国的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现实，出于“爱深痛切”民族情感的影响，竟然也断定中国没有自己走向现代化的可能而主张“全盘西化”，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世界的先进文明。另一些思想家、学者，则深深地眷恋着五千年古国的文明，在主张奋力学习、赶超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同时，力求寻找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变的内在契机，认定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②，从而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的论争中，形成了著名的“外铄论”与“内生说”两大对立观点。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的论争进入了一个新历史时期。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封建社会性质的论战中，运用他们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在具体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中，得出了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结论，从而断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运动开始于明清之际。20 世纪 40 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后，以侯外庐、邓拓等为代表的—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继续深入对中国的经济史和思想

在西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首先提出“中国社会停滞论”的观点。郭大力、王亚南译的《国富论》云：“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中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其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了。”参见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第 1 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 页。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而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文艺复兴’绝相类。”参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 页。

史进行研究，进一步认定明嘉靖、万历之际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传统的哲学文化也开启了向现代转化的思想运动。

但是，囿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学术研究打上了很浓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能客观、冷静地评价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作用，在为“内生论”观点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经济史论据之后，未能看到西方文化在对中国现代化历程产生负面影响之外，还带有客观的促进作用与进步意义。因此，在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论争中仍然有变相“全盘西化”之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中期，以冯契、萧萐父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明清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内，继续沿着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侯外庐先生等人的思想主张，以更加充分的思想史资料说明了“从万历到五四”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谢过程“是一个同质的文化过程”，并且更加客观地评价了利玛窦以降的西来传教士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引发作用，比较全面地论证了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蜕变的历史进程中内因与外因的交互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研究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对文化影响的基础之上，揭示新的经济基础对新思想的种种影响，未能更进一步地探讨民族文化的价值主体对现代文化形成的诸多影响，因而在回答中国现代化历程为何如此漫长的问题上，还缺乏令人满意的答案。有鉴于此，本书着重从价值观念变化的思想历程出发，探讨中国现代文化产生、发展的特殊历程及其形态，力求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化对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民族自身内部的现代性因素的认识。

① “从晚明到‘五四’，历时三百多年，中国的启蒙思潮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就其思想脉络的承启贯通而言，确可视为一个同质的文化历程。”参见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导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二、现代化：普遍的抑或是特殊的问题

何谓现代化？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化都有自己的定义，难以尽述。而且，现代化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即使在西方社会也是很晚才出现的事情。在早期现代化理论的各种著作中，现代化即等同于西方化，或工业化。20世纪中后期，随着理论界对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强，现代化的理论也有所发展。今日国际学术界通行意义上的“现代化”一词其实是很晚才产生的。迪恩·C·蒂普斯曾说：“具有当前这种含义的‘现代化’概念起源不久，但到了60年代，它已经是一个在美国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际社会科学——的语汇中得到确认的词语。”在蒂普斯看来，“现代化概念的普及决不是因为它作为学术交流的工具而具有的清晰性与准确性，而是因为它有能力揭示那些用来概括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随着工业化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产生的社会生活各种转变的含糊和笼统的想象”^①。此处仅引述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

1. 现代化问题的历史溯源

从现代化的发生学角度看，早期的马克思对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能否在非西方世界产生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论者。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

^① 迪恩·C·蒂普斯：《现代化理论与社会比较研究的批判》，[美]西里尔·E·布莱克编，杨豫、陈祖洲译：《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①而且，就像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正是因为持有如此的观点，早期的马克思对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历史变化基本上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他不认为东方社会能够产生出现代社会。他说：“从遥远的古代直到 19 世纪最初 10 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③只是“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才破坏了印度传统的社会形态，使那些“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的“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家庭式公社”^④瓦解了，“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⑤。

早期的马克思还认为，现代化是有自己的客观历史进程的，那就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西欧社会逐渐向非西方世界扩展。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化虽然表现了一定的历史残酷性，然而这是人类社会在前进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如他对 19 世纪英国的现代化工业摧毁印度的“细小刻板”的“村社制度”的“社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6 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7 页。

^③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3 页。

^④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5 页。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5 页。

会革命”运动的评价就是如此，从历史道德感情的角度上说，他对印度社会里的农民持一种同情的态度，然而从历史理性的角度看，在历史发展的铁的规律面前，他又对英国殖民地所发动的这场革命基本上是持一种肯定的态度的。他以诗一般的语言深刻而又警醒地分析了传统社会中种种不人道现象，从而肯定了现代工业社会对传统公社解构的历史合理性。他说：

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服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

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①

当然，马克思对英国在印度所造成的“社会革命”的动机亦加以强烈地谴责，认为他们“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②。然而，他相信经过这一残酷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走向更为光明的时代。他说：“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③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这个新世界的来临还是应该歌唱：

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
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
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
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

不过，我们应该理解早期的马克思关于现代化思想的价值取向，他是对资本主义无情的批判为自己理论的终极任务的，因此，他肯定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仅是认为资产阶

①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766页。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级所主宰的社会为更高级的社会来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说：“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①然而，马克思本人不相信资产阶级能为人类带来真正的福音，他认为只有在资产阶级创造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再发生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②。

早期的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深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而且由于当时他所掌握的东方社会资料极其有限，对于中国及印度的历史不是十分熟悉，因而他对印度、中国以及东方社会的历史持一种停滞论的观点，否定了中国和印度社会内部的自我更新力量，从而一方面歌颂现代资产阶级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又将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看成是人类历史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过程。他将黑格尔的抽象“历史理性法则”转化为客观的历史动力，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着重从客观的物质力量角度分析现代社会的产生、发展的必然过程，从而对自西方到东方的现代化过程持有一种比较单纯的乐观主义态度。

19世纪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再加上马克思本人对人类学资料的掌握更加丰富了，晚年的马克思对于现代化问题的看法有

^①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②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所改变。他认为，俄国及东方社会可以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痛苦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便是马克思晚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他批评了米海洛夫斯基对自己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误解，说道：“我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① 由此可知，晚年的马克思反对简单化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他认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② 由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下并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种社会在结构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公有制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具有稳定性；另一方面，房屋、耕地及小块土地的产品私有又使个体获得了发展的可能性，而社会的公有制又可以平衡因个体的发展而带来的社会分裂倾向。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公有财产的私有化，又致使公社向私有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向私有化方向发展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方向，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公社可以战胜私有化倾向，而私有化也可能战胜公社的公有化倾向。这两种可能性的实现完全由具体的历史环境决定。^③ 而且，晚年的马克思并不认为私有制是导致社会进步的惟一条件，亚洲社会可能有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然而，这条道路的具体形式究竟是什么样子呢？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从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30 页。参见尹树广《晚年马克思历史观的变革》一书，第 136~141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31 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35 页。

前亚洲的社会现代化实践来看，我们一时也还很难说清楚，有待进一步探索。^①

另外，根据国外马克思研究的最新成果来看，马克思在现代化的问题上并没有持一种物质、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如以色列的学者什洛莫·阿维内里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现代世界的兴起作了经典性的描述，强调人类活动的普遍化与合理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②“马克思论述欧洲现代化的重要之处，在于他没有把欧洲的现代化归因于工业革命和技术变革（就像关于马克思的读物那样），而认为技术的变化与革新乃是由社会制度、习俗和社会行为的变化所引起的。”^③ 这些论说是否完全符合

^① 尹树广认为：“晚年马克思的历史观不仅指出了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历史发展中存在东西发展道路上的不同，而且也指出了在人类解放的过程中，同样并存着‘哥达纲领批判’式道路与跳跃卡夫丁峡谷式道路。他突破了单一的社会主义模式，除了主张在西方的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之上建立社会主义之外，又提出了一种不经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建立在原始公社所有制和发达物质生产力结合实际的社会主义形式。”而且他引申说：“这就是说，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不同，决定了社会主义存在形态的不同，东方式的社会主义必然与资本主义共处发展交往，提高生产力，发扬创造的自由精神和尊重人的价值是马克思设想的这种社会主义形式的本质。”（《晚年马克思历史观的变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1 页）我对此表示怀疑：第一，马克思本人晚年的思想是否作了这样的转变，还可以进一步作研究。第二，尹先生的这种引申是否离马克思本人的意思相去太远了点。我的观点是：可能有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然而直接在公社的制度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恐怕是一种乌托邦。

[以色列] 什洛莫·阿维内里：《马克思与现代化》，[美] 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 页。

[以色列] 什洛莫·阿维内里：《马克思与现代化》[美] 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10 页。

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然而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是值得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关注的，它至少表明，对现代社会发展动因的探讨可以有多重视角，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

在论述现代化的问题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承认社会经济对社会影响的前提下，几乎走了一条与马克思完全相反的论述道路。他主要偏重于从文化与社会变迁关系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在欧洲以外的其他社会不可能产生西欧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为自己的研究规定了明确的目标。他说：“我们只是试图阐明宗教力量在我们这一仍然发展着的世俗近代文化之网的形成过程中，在无数不同的历史因素的复杂的相互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① 韦伯坚决反对仅从一种经济的发展就简单地推导出出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做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其实是一种经济的与文化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点上颇有恩格斯所说“历史合力”的意思。韦伯坚决反对单纯的经济决定论，他说：“我们必须消除这样一种想法，即宗教改革，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结果，或许可以从某些经济变革中推断出来。无以数计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纯粹政治的发展过程，不能归结为经济规律，也不能用任何一种经济原因来解释，它们必然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使新建立的教派得以幸存下来。”^② 当然，韦伯也反对把资本主义精神简单地归为“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③。而只是力图阐明新教的某些精神，

[德] 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67 页。

② [德] 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67 页。

[德] 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67~68 页。

特别是“合理性”的观点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产生过的积极作用。

尽管韦伯在论证的角度上与马克思相异，然而，他的结论与早期的马克思相同，那就是资本主义是西欧社会的产物。首先，他认为新教徒所具有的天职观念，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专业分工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如韦伯说：“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的理由。”^①其次，他从法权制度和簿记制度等方面论证了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独特性。他认为清教徒重视“严肃庄重的律法精神”，使得早期资本家可以合理地组织资本。在比较宗教学的视野里，他分析了犹太教与清教的不同。他认为犹太教的“精神气质乃是贱民资本主义类型的”（当然，这里可能包含了韦伯对犹太人的偏见——引者注），“而清教徒的精神气质却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与劳动”^②。他又说：“在任何情况下清教的世界观都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这点当然比仅仅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它在这种生活的发展中是最重要的，而且首先是惟一始终一致的影响。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

要而言之，在早期的马克思与韦伯看来，原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欧洲的社会文化土壤中才能产生。至于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能否在世界其他地区传播，那是另外一回事。

^① [德] 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128 页。

^② [德] 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129~130 页。

[德] 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136 页。

2. 20 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代表观点

詹姆斯·奥康内尔（尼日利亚阿赫马都贝洛大学政治管理系主任）说：“在社会科学中，有一个名词用以指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社会或前技术的社会逐渐消逝，转变成为另一种社会，其特征是具有机械技术以及理性的或世俗的态度，并具有高度差异的社会结构。这个名词就是现代化。”^①不过他并不认为“现代化”这个词能准确地描述其对象的真实意义，就他本人的意思来看，“现代化是探索性和创造性思想态度的发展，它既是个人的思想态度，也是社会的思想态度。这种态度隐藏在技术和机器使用的背后，引起个人之间社会关系产生新形式”^②。现代化在三个方面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所包含的各种成份在有效功能的意义上是相互作用的，其中任何一种功能都需要所有其他成份也起有效的作用。这些成份在它们只有通过个别的人类活动才能产生作用的意义上说，是行为的。它们形成一个系统，意味着每个成份的活动中发生的重大变化都将与所有其他成份的活动中发生的重大变化有联系。”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将“现代化视作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经行的转变过程。业已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经验表明，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某些社会因素径直被改

^① [尼日利亚] 詹姆斯·奥康内尔：《现代化的概念》[美]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 页。

[尼日利亚] 詹姆斯·奥康内尔：《现代化的概念》，[美]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 页。

[尼日利亚] 詹姆斯·奥康内尔：《现代化的概念》，[美]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 页。

变，另外一些因素则可能发生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①。该书的作者们认为：现代化过程中，与社会变革相关的因素很多，它们大体包括这样一些方面，如“国际依存的加强，非农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增长，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向低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各种组织和技能的增生及专门化，官僚科层化，政治参与大众化（无论民主与否）以及各级水平上的教育扩展”^②。而且，他们认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③“现代化一经在世界上任何一地展开，其影响便无可避免地渗及全球各处，不管这种影响靠的是武力还是人心所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人为了使自己的现代化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动力）区分开来，将“现代知识的空前增长视为历史的原动力，并把现代知识造成的政治发展程度、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准看作是关系到国内和国际状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 页。与该书相近的观点还有李工真教授的《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认为：“‘现代化’这个概念，一般来说，也往往是指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在以工业为先导和前提的基础上，发生在社会各个不同层面上的历史变迁过程。它既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幅度提高，经济的迅速发展，物质财富的巨增，也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价值观念的更新。”参见该书第 2 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 页。

^③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 页。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 页。

况的关键矢量”^①，从而形成了两条关于现代化的解释原则，第一条认为：“无论是对于现代化的先行者还是对于后来者而言，现代化过程实质上都是一种国内的转变。”这条原则突出强调了不同的前现代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多大的能力接受现代知识，并因此而确立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等所需要的体制与政策的变革，从而“增强自身传统体制的适应性”。第二条原则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只能用最易获取的指标，即政治的、经济的、人口的以及其他指标（尽管其中没有任何一项能完全令人满意）来衡量，而不能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或其他体制上的规范来衡量。”^②这条原则力求避免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渗透到解释之中，使有关现代化的标准更能保持价值中立，从而增强其科学性。

S. 艾森斯塔德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现代化作出界定。他说：“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 17 世纪至 19 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③而且不同的前现代社会因为其文化背景不同，其进入现代化的方式亦不一样，“在西欧，它们发轫于有着兴盛的都市的封建或专制国家；而在东欧，它们则来自高度独裁而低等都市化的国家与社会。在美国和英属第一批自治领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此句中“领地”的“地”字为引者加），它们是经由殖民化和移民过程而形成的……在日本，现代化过程起源于—

^①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 页。

^②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17 页。

谢中立、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64 页。

个略具独特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而在中国，它则是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帝制，即一种基于特殊类型的‘文士—官僚’制度崩溃后形成的”^①。

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从政治学角度对现代化的特征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②可以从以下四个大的方面来考察现代化对人与社会的影响：第一，“从心理层面讲，现代化涉及到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转变。持传统观念的人期待自然和社会的连续性，他们不相信人有改变和控制两者的能力。相反，持现代观念的人则承认变化的可能性，并且相信变化的可取性”。第二，“从智能的层面讲，现代化涉及到人类自身环境所具有的知识的巨大扩展，并通过日益增长的文化水准、大众媒介及教育等手段将这种知识在全社会广泛传播”。第三，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现代化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的明显提高、职业性和地域性流动的增长，以及个人升降沉浮速度的加快，特别是和农村相比，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第四，从社会的角度看，“现代化一般会将它们和那些自觉组织起来并具特殊功能的高一级社团联系起来，从而使家庭和其他最基层组织的生活获得新的补充”^③。他还特别分析了与政治关系最为密切的各层面的现代化所展示出的两大显著特征：其一是“社会动员是一个过程”，“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和传统社会的人们分道扬镳，并向现代

谢中立、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65 页。

^②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30 页。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30~31 页。

社会的人们看齐”。其二是“经济发展指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和产品的增长。它可以用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平来衡量，还可以用个人享受的福利水准来衡量，而确定福利水准又不外乎平均寿命率、热量摄取数、医院和医生平均占有一类的指数’^① 不过，亨廷顿主要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成熟型的现代化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其中与本书主题相关的内容是他强调了价值观念变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艾恺将现代化定义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② 他认为自己的定义特别突出了现代化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主宰世界（world mastery）的两个方面的意义。这种分析并没有超出韦伯对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3. 20 世纪部分中国学者对“现代化”的理解

如果把对工业化的讨论也纳入广义的现代化问题视域之中，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写作的博士论文——《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可以看作是这场讨论的先驱者之一。他对“工业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界定。他说：“工业化是经济转变的一种最显著的现象。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工业化的特征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说明。如果着重技术因素，工业化可以定义为一系列机要生产函数发生变动的过程。若着重资本这个因素，则工业化也可定义为生产结构中资本广化和深化的过程。若着重劳动这个因素，工业化更可定义为每个人劳动生产率迅猛提高的过程。所有这些特征合起来指明一件事——经济飞跃进步，其意思就是以较小的人类劳动，获得更大得多的物质利益这一目的的”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31 页。

^② [美] 艾恺（Guy S. Llitto）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 页。